

聚合与流散

——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赵园 著

我写这本书，最初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。在《流散》出版之前，我曾写过《鲁迅的早年》、《鲁迅的晚年》、《鲁迅的中间》等书，其中《鲁迅的早年》和《鲁迅的晚年》都是写鲁迅的早年和晚年，而《鲁迅的中间》则是写鲁迅的中间。在写《鲁迅的早年》和《鲁迅的晚年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鲁迅的早年和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写《鲁迅的中间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鲁迅的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写《聚合与流散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我写这本书，最初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。在《流散》出版之前，我曾写过《鲁迅的早年》、《鲁迅的晚年》、《鲁迅的中间》等书，其中《鲁迅的早年》和《鲁迅的晚年》都是写鲁迅的早年和晚年，而《鲁迅的中间》则是写鲁迅的中间。在写《鲁迅的早年》和《鲁迅的晚年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鲁迅的早年和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写《鲁迅的中间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鲁迅的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写《聚合与流散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我写这本书，最初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。在《流散》出版之前，我曾写过《鲁迅的早年》、《鲁迅的晚年》、《鲁迅的中间》等书，其中《鲁迅的早年》和《鲁迅的晚年》都是写鲁迅的早年和晚年，而《鲁迅的中间》则是写鲁迅的中间。在写《鲁迅的早年》和《鲁迅的晚年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鲁迅的早年和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写《鲁迅的中间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鲁迅的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写《聚合与流散》的时候，我曾感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，想知道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

聚合与流散

——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

对于明清之际，我的兴趣始终在士大夫的处境与命运，包括展开在上述伦理关系、日常情境中的命运。明中叶以后，士人对当代士风之恶浊，批评不遗余力，我由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，却常能遭遇极清明纯净之境，赤子般的真挚与热诚。易堂诸子涉世均不够深，应当属于“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”的一类，是天性的诗人，尽管不以诗名。我想，光明俊伟的人格，任何时候都会令人神旺的吧。至于某个人物的魅力，自然会销蚀在时间中，但它们毕竟以其短暂的存在照亮过他人，即令细微如烟火，也是美丽的。易堂诸子孜孜于“求友”，以他人丰富自己的人生。在写作了本书后，易堂诸子在我，已非漠不相关的异代人，他们由故纸中走出，径直走入了我的世界。

——赵园

ISBN 978-7-5059-6177-7



9 787505 961777 >

定价：29.00元

赵园 著

聚合与流散

——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聚合与流散：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/ 赵园著.

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8.12

ISBN 978-7-5059-6177-7

I.聚… II.赵… III.士-研究-中国-明清时代 IV.D691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8447号

书 名	聚合与流散——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作 者	赵 园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 刘 旭
责任校对	师自运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5.75
插 页	2页
版 次	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978-7-5059-6177-7
定 价	29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自序

关于这项考察的缘起,《易堂寻踪》的后记已说得很清楚。

当初选择这题目,多少也因了所在的研究所恰有三魏以及彭士望、曾灿等人的文集,而彭、魏等是所谓的性情中人,文字清浅,无不长于自我告白,文集中有大量可资利用的内容;对于想象这一群体,几乎自足到了可以不假外求。较之面目全非的“实地”,上述情况更合于我的期待——我的兴趣始终更在那一时期士人的心史。

与历史人物结缘可以有种种途径,学术只是一种,却有可能是使这“缘”较为坚实的一种。有人终生致力于某一人物的探究,即与那人相伴一生——未必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生存方式。易堂诸子不属于这种人物,却如我在自己的大半生中有机会遇到的某些人那样,即使不能改变、也润泽了你的生活。这是一些天性纯洁的人物,不但使自己的人生保持单纯明亮,且能以清新的气息感染他人。当着社会空气日趋浑浊,你不能不怀念这种古老的诗意。

作为词章之士,魏禧的才调绝非超众逸群。

其时有人比之“三苏”，未必蓄意阿谀，更可能出于近距离判断所难免的误差，也令人想到“当世名”的不足恃。但魏叔子当年的确曾负盛名。同时的施闰章说，他所闻当世之论文者，多举汪琬与魏禧两家（《寄魏凝叔》，《施愚山集》文集卷二八）。邵长蘅《魏禧传》说其时有“侯魏”的说法，将魏禧与侯方域并称；却又说两人“操行不同”。^①梁启超批评《魏叔子文集》，以为品格远不如唐甄的《潜书》。四库馆臣却说：“甄与魏禧友善，故其文格颇相类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存目《潜书》）

叔子颇以其文字自喜，态度中不免有几分天真。他说过：“人之能载万物者，莫如文章。”（《论世堂文集序》，《魏叔子文集》卷八）即使由今人看去，叔子的文字也有动人之处，议论慷慨淋漓，又非一泻无余，有自然纾徐之致，语势富于转折变化；好用“倾谈”态度，有对象感，热切恳挚；善叙家常琐屑，能委曲尽致。其《跋苏文忠书醉翁亭记》（同书卷一二）后有邱维屏的评语，说叔子之文“喜往复，善自道”。这确也是叔子所长。“善自道”从来是一种能力；魏氏赋有此种能力。《魏叔子日记·论文》曰：“文之感慨痛快驰骤者，必须往而复还。往而不还，则势直气泄，语尽味止；往而复还，则生顾盼。此呜咽顿挫所从出也。”可注他本人的文字。王源甚至说：“自魏叔子先生歿，而文章几乎熄”（《梁质人文集序》，《居业堂文集》卷一三），未免夸张，却也可见那一种“志士”之文的感染力。

易堂其他人物如邱维屏、彭士望、魏际瑞、魏礼，当时也以能文见称，不彼此模仿，各有其面目。彭氏长于议论，文笔的劲悍足以副之，气势夺人，沛然有一泻千里之势，却又如魏禧所形容，“段落牵带，如连波叠嶂，相引无穷”（《树庐文钞》卷三《复王元升书》文后附）。邱氏每有“奇思巧论”，不事蹈袭，不循故常。魏伯子对说理更有兴趣，好为分割辨析；季子则善用排偶，议论纵横。

^① 叔子对侯朝宗的文字并不佩服，说：“予每读朝宗文，如当劲敌，惊心动魄，目睛不及瞬。其后细求之，疑其本领浅薄，少有当于古立言之义；又是非多爱憎、失情实，而才气奔逸，时有往而不返之处。”（《任王谷文集序》，《魏叔子文集》卷八）

魏禧将易堂的“经义”与程山的“理学”对举，自承了与帖括的关系。诸子的文章技巧，的确应得诸制义的训练，尽管魏禧、邱维屏，对制义的态度有不同。明人文字，怕是“帖括气”多有的吧；制义之于一时代文事，之于士人文字技巧的训练，其功用或也不全是负面的。至于魏禧以“制举业”授徒谋生，影响于其论文的态度与见识，与同时的文章大家、学术史家如钱谦益、黄宗羲的文论，确也远非在同一境界、

对于本书所写人物，我是喜爱的，无论其有无思想史或文学史的地位。对自己的这本小书，也是喜爱的；在我，这也属于那种不可能在另一时间写出的文字。写作时用了随笔一体，为积习所限，却并不就能放任想象，信笔挥洒。于此“学术”始终构成了隐隐的制约。对文献时有怀疑，也有效地节制了情感。那行走中所见，却至今不曾忘怀，每每想到赣南的山水，临河的与埋在大山褶皱中的村落。由走在山道上的宁都人，你无从推想易堂诸子生活的时代，但其地的植被，沿用至今的耕作方式，以至人的体貌特征，想必与叔子们在世时相去不远。

《易堂寻踪》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后，治古代文学的严迪昌先生曾写了信来。当时我对严先生的研究，几乎一无所知，后来得到了严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才想到他的信写在病中，我却错失了向他请教的机会。

本书对《易堂寻踪》做了校订，补入了一些为原书体例所限而不能纳入的注释。附录中的《易堂三题》，曾作为拙作《制度·言论·心态——〈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〉续编》的附录。《寻踪》与《三题》体裁不同，内容各有侧重，互为补充，合成了我关于易堂的考察。

我应当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这项考察的人们，尤其当年约写《易堂寻踪》并与我一同“走过赣南”的刘景琳先生，该书的责编张国功先生，江西教育出版社及中国文联出版社。希望这本小书能使读者获益。

赵 园

2008年7月

序

陈平原

如果你对悠久的中国文化有兴趣，而且恰巧又喜欢旅行，那么，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——烟雨迷蒙中，抬头一看，迎面走来李太白的“蜀道”、苏东坡的“赤壁”，或者鲁迅的“社戏”、朱自清的“荷塘月色”。那时，你很可能心头一紧，眼泪险些掉下来。真没想到，“历史”和我们竟“近在咫尺”！

这个时候，该抖落的，不是什么“历史的尘埃”，而是你我因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养成的感觉的麻木与性格的卑琐。在不尽如人意的人生旅途上，邂逅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，并借以穿越时空，尚友古人，阅尽人世沧桑，实在惬意。可惜，并非每位读书人都有如此“艳遇”。除了时间与金钱的限制，还包含着知识储备与审美能力的差异。这个时候，你很可能希望找到一位热心、有趣而且善解人意的好向导，以便追随其纵横古今、驰骋八方。既经得起书斋中的认真品味，又可以在旅途上随意翻阅，这样的书籍，其实并不

好找。此等境界,不是无人想到,而是很难做到——不能太轻,也不能太重;不能太深,也不能太浅;不能太雅,也不能太俗。如若悬得过高,很可能一无所成。这里只是希望在幽深的历史情境与平实的日常生活、冷僻的书斋与广袤的大地之间,架一座五彩斑斓的小桥,以便有心人在上面悠闲地漫步。我曾经将这种介于学术论文与散文小品之间的文字,称之为“第三种笔墨”。有学问家的底子,而且用的是专题研究的架势,围绕某一课题集中写作,因而不像一般随笔集那样汗漫无所归依;但毕竟不是专门著述,不必正襟危坐,心态以及笔墨都尽可能地放松。之所以只提“尽可能”——而不是“彻底”——放松,是因为意识到其中的陷阱。实际上,“面对大众”这一写作策略,并非轻而易举;相反,很可能是另一种苦心经营。经验丰富的作者与读者,大都有这样的经验:厚重的大书容易藏拙,反而是小书,稍不留神,即出乖露丑。钱钟书的《围城》里有这么一段话,大意是:猴子登高,容易露出红屁股;但并非坐在地上时屁股不红,只不过人家不注意罢了。此妙喻可略为转化:小书之所以难以藏拙,因其便于阅读;一旦备受关注,就很容易露出见不得人的“红屁股”。

正是在此意义上,我强调所谓“第三种笔墨”不是退而求其次,而是“另一种苦心经营”。经营学问,经营文字,经营心境,更经营感觉与趣味。因此,套用一句国人大都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,此乃“外松内紧”。既不故作“放松”科,更不比附“行走文学”,这里所收的著述,大都是书斋里多年经营的结果,只不过以旅途为线索,且出之于随笔文体。

在我看来,图文并置不仅仅是为了好看,更希望二者之间能够互相阐释。这样一来,图像与文字的作者,最好能够合一。换句话说,假如希望图像乃文字的自然延伸,图文最好同时生产——只有在文字作者眼前浮现的,才是最恰当的风光与情景。这一追求图像与文字“亲密无间”的制作思路,很可能会以降低图像的精美程度为代价。毕

竟不是专业画家或摄影家,其对于图像的制作、品味与呈现,自不能与其娴熟的文字能力相媲美。这种“爱美的”(amateur,业余的)图像制作,对于这套丛书来说并非缺陷,因其正好与我们的另一思路相吻合:图文书不应满足于成为图书馆的收藏或鉴赏家的把玩,而应该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融合专家的学识与文人的趣味,兼顾读者知识与金钱两方面的接受能力,而且还希望经得起爱书人的再三品鉴,这样的好事,自然不会从天而降,只能寄希望于学界同人的通力合作。

作为这种理想的“小书”的热心读者,我翘首以待。

目
录

南昌—赣州	/ 1
宁都	/ 8
宁都·翠微峰(一)	/ 30
宁都·翠微峰(二)	/ 80
宁都·冠石	/ 110
南丰—星子	/ 137
附录一 《翠微峰记》(魏禧)	/ 143
《翠微峰易堂记》节录(彭士望)	/ 145
附录二 《走过赣南》	/ 151
《易堂寻踪》后记	/ 159
附录三 易堂三题	/ 165
征引书目	/ 233

南昌—赣州

1

客机飞临南昌机场时，在倾斜的机翼下，我看到了红黄相间的田块。黄的应当是油菜花。直到更接近地面，我才看清了，红的是泥土。在这一刻，我有隐约的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正在接近我的故事发生的地方。此后的一周里，我一再看到红土地，看到赭色的山壁。我的江右印象，就由这红与浓绿涂染而成。

动身来这里之前，我对于明清之际一个被称作“易堂”的群体发生了兴趣，读了其中人物的文集。这些今天已乏人问津的文集向我讲述的，首先是一个个关于友情的故事，与此线索平行或交叉的，另有关于兄弟、夫妇、师弟等等的故事。我当然明白，无论朋友的还是兄弟的故事，都已然古老，却仍然认为，我的这些发生在动荡时世的故事，当由一些鲜明生动的个性演绎时，与平

世的同类故事势必有所不同。我将由南昌再度启程，向距这里数百公里的赣南山中寻访那些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在这省城不过稍事停留。

行前我就由文献中得知，南昌地处“百粤上游”，为“三楚重辅”，在本书所写的那时代，被由军事的角度，视为“咽喉之地”（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84第560页）。元末群雄逐鹿，鄱阳湖曾有过激战。二百余年后，明清易代之际，南昌几乎成了炼狱。其时客居江淮的王猷定（于一），听家乡来人说，南昌的东湖“蓬蒿十里，白昼多鬼哭”（《东湖二仲诗序》，《四照堂集》卷2）。施闰章也曾慨叹道：“流血一何多，江水为之深。”（《同门李东园按察豫章乱后感寄》，《施愚山集》诗集卷12）

抵达南昌的次日，我就走了东、西湖。两湖自然经了整修，西湖有乌市，东湖则到处可见神态悠然的退休者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些公园中休闲的老人，其先辈是否就是那次劫难的子遗？

我正待寻访的人物中，有南昌人彭士望（躬庵），是其时江右的文人，对明末南昌的繁盛及劫后的残破有过记述。据彭氏说，战乱前的南昌，“东西湖最盛，诸府第高明之家、试士院皆临湖。湖东泮为孺子亭学舍，容生徒百十人，与三洲蔬圃相望”，湖中则有“轻舸画舫”，觞咏杂歌，“丝竹管弦，出没于烟波雪月之际。桥流宛转，花屿萦回，水禽时鸟，翔鸣上下，台榭阁道卉木，士女姣好，望之若画图，今俱化为瓦砾，灌莽蔽之……”（《赠董舜民游江粤叙》，《树庐文钞》卷6）彭氏对此，自不胜今昔之感。今天的东湖公园中，孺子亭、碑尚在。徐穉，字孺子，南昌人，东汉高士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：“陈仲举言为士则，行为世范，登车揽辔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为豫章太守，至，便问徐孺子所在，欲先看之。”

写上引文字时的彭士望，侨寓赣南已三十年，既目睹过当年的繁华，彭氏与一同隐居的伙伴，梦境总应当有所不同的吧。即如这昔日繁华的碎片，那些光与影，必定会久远地残留在他此后的生涯中。

离开南昌前，到了城郊的八大山人纪念馆。奇怪的是，由文集看，我



南昌·八大山人纪念馆内

所欲寻访的赣南的易堂诸子，似乎不曾与同为遗民且在南昌的朱耷互通消息，只有他们的门人梁份的文集中，有致朱氏的书札。

我承认我对这城市缺乏更广泛的兴趣，预定目标及“寻访者”的自我意识，缩小了我的关注范围。我竟然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去观看这城市。对于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一段故事的专注，使我对于眼前经过的纷繁人生视若无睹。即使这样我也知道，在这些像是并无特色的街巷中，在看似与其他城市一般无二的日常生活里，一定有所寻访的那段历史隐现其间，只是我不具备足够的敏感去辨识罢了。

2

由南昌乘火车抵达赣州时，我看到了一座整洁的小城。赣州是章、贡两江的交汇之地，我故事中的人物之一曾灿，一再称此地为“双江”。

他的朋友陈恭尹说：“赣之为州，合章、贡二水而得名。”（《命儿赣字端木说》，《独漉堂全集·文集》卷15）当年或许曾经舳舻十里、灯火万家的？

赣州车站位于高地，四望空阔，并无我想像中的险要。我所寻访的人物称此城为“虎头城”，不免令我望文生义，以为类似雄关，却只看到了一些陵阜。很难相信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战事，在明清之际的大故事中，竟以情节紧张而扣人心弦。由现代战争的角度，你已难以设想赣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。而据上面提到的顾祖禹说，赣州府“接瓯闽、百粤之区，介谿谷万山之阻，为岭海之关键，江湖之要枢。江右有事，此其必争之所也”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88第581页）。

由北京动身前得知的，是赣州连绵不断的雨，这里却一派响晴。在这小城宁静的午后，我所要寻访的，却是一个惨烈的故事：三百多年前，经历了抵抗清军的激战，围城陷落，一个叫杨廷麟的人物——他当时的身份，是南明隆武朝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——在这城中一处水塘自沉了。

此外我还知道，他埋骨在章江边一处叫“杨秀亭”的地方，我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魏禧，曾在那片墓地留连，悲怆不已。我相信仅仅想到了这些事，就已足以使我对这城的感觉，与别人有了一点不同。那遥远年代的故事正如水似的，悄然浸润着我，而在寻访并试着讲述它的同时，我被自己参与营造的氛围笼盖了。

关于顺治三年（丙戌）赣州的战事，正史与私家都有记述：杨廷麟与万元吉守赣州，围城半年，城破，杨氏赴清水塘死。这天是十月四日。乾隆四十七年刊本《赣州府志》卷2《地理志·风土》：“赣州府风近闽、粤，而人抗志励节，有勇好斗，轻生敢死。”明清之际的这一仗，为上述“轻生敢死”做了注脚。据陆世仪的《江右纪变》，三日清军攻入赣州后，“乡勇犹巷战久之。四日黎明，北人大至，城上发炮皆裂，遂陷”（黄宗羲《行朝录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册第173页）。当时有一个来自宁都的青年，本来可以逃生的，却选择了与杨廷麟同死（《别驾杨公传》，《丘邦士先生文

集》卷15)。

弘光朝覆灭之后,赣州之役原是绝望的抵抗,黄宗羲却还要说,“赣州之守与死者,皆三百年以来国家之元气也。”有一点大约是确实的,即赣州陷落,南明朝在江右的坚守从此溃决。方以智说,自杨廷麟等人死,“吉安山中之帜,先后俱尽”(《刘大司马传略》,《浮山文集前编》,转引自《方以智年谱》第171页)。其时的血,淋淋漓漓地渗入了泥土。而在这血战之余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,那段历史像是已溶入了空际,与他们杳不相关。想不到的是,那清水塘居然还在,被裹在杂乱无章的民居中,塘边是浮萍与垃圾,想必是孑孓的滋生地。

在此期间,来自宁都的曾灿曾试图召集散亡,助杨廷麟一战。那年灿二十岁。彭士望也曾为杨廷麟募兵九江,还曾在赣州陷落后赎救杨氏遗孤——在当时做这件事,不消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而魏禧则自居杨氏门人,病故的前一年赴泰和就医途经赣州时,曾在杨廷麟墓前“拜伏,不胜呜咽”。那墓地当时已“荒冢蔓草,芜秽不治”(《崇祯皇帝御书记》,《魏叔子文集》卷17),斜阳中但见两岸蓼花,一江秋水(同书卷7《拜杨文正公墓》)。

黄宗羲也在同一年,到南屏寻找过张煌言的墓地。寻找,是一个意在记忆的动作。大约因了对遗忘的恐惧,叔子不厌重复地,一再提到杨氏墓地所在方位。据带我们到此地的赣州的张先生说,这一带后来叫“杨公地”,自然因杨廷麟而得名,可知他在清代,还被赣州人纪念着。居住在这里的人知道这地名,指点着大致方向。这儿是一带高岸,俯临章江。江面宽阔,有小火轮远远地驶过。张先生说,他儿时在这周围嬉戏时,杨廷麟的墓碑尚在。赣州正在实施“一江两岸”工程,墓地所在,是平坦的滨江大道,道边花团锦簇,全没有了魏叔子、曾灿所形容的“萧瑟”。隆隆的车声会不会使得杨公廷麟魂魄不安?

半年的围城之后,战事自然异常惨烈。一些年后,曾灿仍像是能听到战马的悲鸣:“记得当年万马嘶,虎头城外战声悲。”(《秋旅遣怀兼柬

易堂诸子》，《六松堂集》诗集卷6）那年月，激战之后，往往有一“屠”——战胜者快意的杀戮。曾灿说赣州因了所处地理位置，出入多商贾，城陷之日，无分土著、商贾“皆屠之”，“其骨肉交道路，几与城齐，犬狺狺然走啗人骨”（《赠邑人杨君序》，同书文集卷12）。魏禧也说，丙戌赣州一役，“士民数百万，一朝如断齏”（《金坛王习之持〈易极拟言〉过访……》，《魏叔子诗集》卷4）。

至于上文提到的“虎头城”，则因赣州曾有虔州之称，虔字“声头”。据说宋代董德元曾上言，说虔州号“虎头城”，非佳名。廷臣议，也以为州名有“虔刈”之义，因而改名赣州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第581页）。宋人未曾料及的是，纵然改了名，仍不能免此“虔刈”（即劫掠、杀害）。由后世看来，“虔”竟成了发生于明亡之际的杀戮的凶讖！

乱世诸事的荒谬、诡异，有不可以常情常理来论的；发生于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、局势反复，像是尤有戏剧性。围攻赣州逼使杨廷麟赴水而死的金声桓，竟于一年多之后“反正”（即降清后又归顺南明），其后是南昌的被围与陷落。城陷时金声桓竟也赴水而死，俨若轮回，以至黄宗羲不屑地说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降清且“诛锄忠义”呢！南昌的围与屠，其残酷更有甚于赣州者。据黄宗羲《行朝录》，围城中曾杀人为食，“呼人为‘鸡’。有孤行者，辄攫去烹食”。由金声桓“反正”，到南昌被屠，不过一年间，“合郡之民，死者数百余万”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册第206页）。

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述中，随处可见“屠”的字样，事实却未必全如通常所想像。即使在腥风血雨中，小民的日常生活也会在顽强地继续，而由废墟上重建的速度，或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，而且总有人能由“死地”逃生。这场惨剧发生之前，彭士望和他的朋友林时益就已避乱到了赣南的宁都，南昌被围之时，他们已与宁都的魏氏兄弟住在了翠微峰，躲过了这一劫，因而被许为“先几”。这是后话。

在这小城中，甚至当年的废墟也片瓦无存，令你无从凭吊。血污，创